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关键词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能含糊”

□ 王英杰

“含糊”，通常用来形容言语或意思不清晰、不明确，态度和立场不鲜明、不坚定。在处理重大问题、重大事情、重大关系上“不能含糊”，就是要把准要旨、把稳立场、把牢原则，毫不动摇地坚持、坚定不移地贯彻、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旗帜鲜明、掷地有声地强调阐发了治党治国治军等诸方面“不能含糊”。深入学习体会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举旗亮剑，练就脑子清醒、眼睛明亮、立场坚定的过硬本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14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执行党的纪律不能有任何含糊，不能让党纪党规成为“纸老虎”、“稻草人”，造成“破窗效应”。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强调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彰显了党中央抓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严明党的纪律要更加注重执纪，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执行党的纪律，关键在于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要防止执纪“破窗效应”，就必须对党员干部从严要求、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在执行党的纪律上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凡是违反党章和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的行为，都不能放过，更不能放纵。新征程要一以贯之从严抓好党的纪律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强调，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论做何种工作，说到底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定位，什么时候都不能含糊、不能淡化。人民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我国的名称、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真挚情怀，也是对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希望和明确要求。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党的各级干部要牢记初心使命，践行党的宗旨，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奋斗为了人民，始终做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军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态度要特别鲜明，行动要特别坚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迟疑、任何含糊。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是建军治军的首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核心。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进一步增强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自觉性坚定性，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主流媒体要敢于引导、善于疏导，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点都不能含糊。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这方面，主流媒体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高度团结统一是我们党始终拥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要全党步调一致、团结统一，我们就能无坚不摧，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反之，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遇挫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增进党的团结统一，把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共同目标而不懈奋斗。

2023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省级党委和政府得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决不突破。有关部门要严格考核问责，不能含糊。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必须采取一系列硬措施，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承担起耕地保护主体责任，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作为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严格开展耕地保护责任考核，省级党委和政府对本省域内耕地保护负总责，对省域内各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对突破耕地保护红线等重大问题实行“一票否决”，严肃问责、终身追责。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长牙齿”硬措施工作机制，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确保耕地保护红线决不突破。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提高农民和地方保护耕地、种粮抓粮积极性，进一步增强支撑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开启群众监督的“探照灯”

□ 孙瑞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群众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确保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的关键力量。开启群众监督的“探照灯”，不仅能有效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更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监督。1931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建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等专门的监督机制以保障群众行使监督权。毛泽东强调：“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群众监督在当时的廉政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使苏维埃政府成为清正廉洁的政府，苏区干部称得上廉洁奉公的勤务员。改革开放以后，针对新出现的腐败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事告诉群众，通过民主方法，让群众揭发，再通过群众监督解决。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什么都能发现。”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武义县后陈村调研，他指出后陈村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推进基层民主管理、决策、监督有机统一，实现村务监督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转变，使各种矛盾有了内部化解的机制，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推动下，后陈村这一全国首创的基层民主监督制度在浙江全省推广，并被写入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陈村也成为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村庄。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能够深入到政策执行末梢、社会治理末端，捕捉到许多难以发现的细微问题。无论是一些部门慵懒怠政、推诿扯皮，还是个别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优亲厚友，这些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群众监督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群众切身利益方面有着其他监督不可比拟的作用和优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贯穿社会的方方面面，一项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在具体实施时是否存在流程烦琐、标准模糊等问题，群众作为政策的直接服务对象，对权力运行的感知最直接，发现最及时，也最有资格评判。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血肉联系。群众监督的动机更纯粹、立场更客观、情况更现实、诉求更明确。群众愿意提供信息，且提供的信息具有原生性和针对性。相较于行政化的层层汇报、统计数据，群众能够以亲身经历的具体场景和问题，直接反映问题的实际情况和影响，便于行政部门快速定位、精准施策。他们会从自身需求和社会需求出发，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影响生活质量、关乎政策效果的问题。人民群众作为治理末梢的“眼睛”和“耳朵”，能有效补充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的盲区，尤其在基层“微腐败”“不作为”等问题上具有独特监督优势。

群众监督不仅是发现问题的“眼睛”，更是推动改革的“引擎”。群众监督在实际运行中也有一些堵点。有些地方存在群众“不敢监督”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虽然设立了群众监督渠道，但存在反馈不及时、处理结果不公开等问题，导致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受挫。这些问题如同蒙在“探照灯”上的尘埃，阻碍其照亮权力运行的“盲区”。通过构建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监督体系，请群众参与政策制定、项目建设，将群众监督从“事后纠错”前移到“事前预防”。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打造“智慧监督”平台，实现问题线索收集、转办、反馈全流程线上化，让群众动动手指就能参与监督。这既能提升群众监督的及时性和可操作性，又能增强群众对党政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大有笔潭

破解价值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

□ 关祥睿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破解了价值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从价值的存在论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两极对立

在哲学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是长期支配人们的两种思维方式，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的焦点，主要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价值普遍主义从人和万物本质的共同性、普遍性的观念出发，相信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终极不变和绝对合理的价值体系，认为只要遵循、推广和执行这种一元化价值及其标准，就能解决各种对立、冲突和纷争。与之相对，价值特殊主义以人的主体性、特殊性的观念为基础，认为世界上不但不存在终极不变和普遍适用的价值体系，而且人们必须要面对价值多元化的事实。从现实导向上看，将价值普遍主义极端化，就会产生无视差异性的“普世价值”，成为文化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借口；而将价值特殊主义极端化，就会陷入无视共同性的相对主义，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理由。因此，如何破解价值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既是化解价值冲突、偏执和对立的关键，也是揭露“普世价值”虚假本性的基础。

根据唯物史观，人们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无不来源于社会实践。无论是价值普遍主义，还是价值特殊主义，都有其各自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基础。而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潜藏着深深的利益之争。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普遍性”的幻想，试图“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一些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普世价值”，就是一种“普遍性”的幻想，其实质不过是将特殊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将特殊价值观描绘成普世价值观。与之相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的普遍性，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更不是一种无差别的同一性，而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一种包容特殊性和差异的普遍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全人类共同价值植根于全人类的共同实践活动，是在承认和尊重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的前提下，致力于“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这就为破解价值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开辟了现实道路。

从价值的认识论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共识

价值观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形态，是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系统。价值观产生于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之中，并作为人们内心深处的评价标准来发挥作用。由于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产生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核心价值观。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更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各民族原始的封闭状态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被逐一打破，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世界的普遍交往中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在这一过程中，许多能够满足全人类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得以积淀，日益成为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在价值多元化的事实面前，不同价值观念难免存在分歧与矛盾。但是，价值层面的矛盾与冲突，并不是一种纯粹个体性和特殊性的表征，其根源必须回溯至历史和制度的层面，如此方能在一种整体性和普遍性的视角中寻求化解。越是存在价值冲突，就越是需要寻求价值共识。而要凝聚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共识，必须首先具有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人类关怀。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就是在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使人民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对价值观念和价值实现路径作出明确区分，充分体现了对文明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的尊重，有力凝聚了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共识，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

从价值的实践论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纵深推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交往和依存程度空前加深，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度的价值共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伴随着层出不穷的挑战和不断增多的风险，使人们在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对“人类何去何从”深感忧虑。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在现实中形成，取决于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能否形成价值上的共识，而价值共识形成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共同的需要、利益和追求。

价值共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体现各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才能获得具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就此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是因为它摒弃了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了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定倡导者，又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忠实践行者，不仅为破解价值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方案，充分展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

理论味